

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摘录)*

〔德〕爱·伯恩施坦

十三、苏黎世的学习年代

赫希柏格在我之前来到苏黎世,先是投宿于贝尔维旅馆。几天后,我也到达这里,在市政厅桥,即当年的蔬菜桥旁较为简朴的“白鹳”旅店暂住了几天,之后又在位于利玛特码头和尼德多尔夫大街之间的施勒福尔巷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但六个星期后,我又搬到座落于美丽的火车站大街上的宏伟的中央饭店,在顶层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对于这次搬动我从来没有感到后悔。虽然这里每天要爬的楼梯相当于以前的两倍,但与我可从高处凭眺美景的眼福相比,这简直算不了什么。楼下大街上,矗立着一排排粗大的菩提树,每当花开时,我的房间里满是扑鼻的菩提花香。楼房的一

* 这是爱·伯恩施坦在1928年写的一本回忆录,其中叙述了他从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到1888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被驱逐出瑞士这一时期的经历。这里摘录了其中第十三、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八和三十六节,译自该书1928年柏林德文版第76—80、87—91、113—116、117—131、155—163、186—196页。——编者注

侧,好大一片经常是晶莹清澈的湖水映入我的眼帘,周围是长满林木的山丘。凭窗远眺,瑞士中部的阿尔卑斯群峰巍然耸立。房间陈设雅致,装饰考究,当著名的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那时正在苏黎世工艺专科学校担任艺术史教授的戈特弗里德·金克尔一次来看望我时,竟在门前停留片刻,对天花板赞叹不已。赫希柏格也非常喜欢楼上的房间,尽管爬楼对他来讲远不象对我那样轻松,但有一天他还是从我的女房东那里租下了我隔壁的两间房,其中一间用来作我们共用的会客室。

他暂时在贝尔维旅馆又住了几个月。他在那里的房间成为他代替已遭取缔的《未来》杂志而创办的一份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室。这个杂志的名称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出版者路德维希·李希特尔。由设在苏黎世奥贝尔大街的书商费迪南·克贝尔的出版社负责出版。按照他的计划,该杂志每年分上下两期出版,每期登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文章、对这些领域的重要出版物的书评以及有关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展的报道。除写作上有造诣的社会主义者和原《未来》杂志的撰稿人外,赫希柏格又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请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充当撰稿人。他把同这些撰稿人的一部分通信关系,尤其是同报道社会主义运动进展的通讯员的通信关系交给我,因此我才第一次与国外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如巴黎的彼得·拉甫洛夫(负责俄国)、克拉科夫的博莱斯拉夫·利马诺夫斯基(负责波兰)、布鲁塞尔的塞扎尔·德·巴普(负责荷兰)建立联系。这时我也能够从事从法语和意大利语译成德语的翻译工作。

在年鉴第一期的各篇文章中,赫尔曼·格罗伊利希撰写的题为《无政府理论》的论文,以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战士所特有的简洁明了和尖锐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

的著作家的自相矛盾之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尽管其前提也陷入了乌托邦思想，但却就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提出了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然而，无论是这些文章，还是诸如拉甫洛夫和德·巴普这些消息灵通的社会主义者撰写的深刻报道，都不能抵销年鉴中第三篇文章，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评的箴言》一文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德国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造成的恶劣印象。

这篇未署名而是用三颗星作为标记的文章之问世有着一段独特的经历。对此流传着许多谬误百出的说法。实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卡尔·赫希柏格、卡·奥·施拉姆、瑞士作家泰奥多尔·库尔蒂和我一同坐在座落于苏黎世塔尔大街上的“黑熊”饭店的花园里，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遭受的种种迫害和多数自由党报纸对此采取的软弱态度。库尔蒂一直是《法兰克福报》编辑之一，并在该报上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态度，当时正同他的同胞和同志莱因霍尔德·吕格一道出版由他们共同创办的、与社会民主党关系良好的民主日报《苏黎世邮报》，他试图对自由党人的这种态度作出解释。“不要忘记”，他说道，“你们的报刊和演讲人正是对自由党人进行了片面而充满敌意的攻击。现在表明，这恰恰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哎呀，我们犯的错误够多的了，有什么地方没犯过错误的呢？”施拉姆插话说，“若是把我们的罪过一一列举，那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我抽屉里就有一份类似这样的东西”，赫希柏格这时说。他告诉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的头几天，一位朋友给《未来》杂志寄来一篇稿子。这篇稿子有点象一份社会民主党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自供状，其中声称，党正是由于这些错误而给反动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我当时不知道，发表这种文章的时

机是否合适。这时，《未来》杂志被禁止，我就不必为这件事苦恼了。”他补充说道。或许现在发表它已比较有利。“一点儿不错”，施拉姆答道，“我们在国内的同志已无法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恐怕非常想听一听对迄今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意见，并对此展开讨论。能让我们看看这篇预兆不祥的文章吗？”“当然可以”，赫希伯格回答说，“您明天上午趁伯恩施坦在我这里时，到我旅馆来一趟，然后我给您俩念一念这篇文章。”

施拉姆表示同意。随后，我们首先又就党内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交谈。我在交谈时显得相当被动。尽管我当初对于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全部都赞成的，但由于我本人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所以不便为这时谈到的大部分事情辩解。这一全面的批评看来使赫希伯格感到高兴，直到他转身问我是否也想对什么事提出谴责时，我才说道，哈赛尔曼对群众的阿谀奉承一再使我感到讨厌，在盛大的柏林合并大会上他的这种做法曾使我大为扫兴。

次日上午，赫希伯格把那篇文章念给施拉姆和我听。它的作者是见习法官卡尔·弗勒施，赫希伯格大学时代的一位朋友。文章的标题借用了俄国政治家哥尔查科夫在1856年缔结巴黎和约后说的一句名言，但主语由“俄国”改成“社会民主党”，即“社会民主党凝神沉思，但不怨天尤人”。至于后来发表的文章从内容上讲究竟哪些应由当时尚年青的弗勒施负责，后来就无法断定了。念完这篇稿件并加以讨论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商定，对一些地方加以改写和补充，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由施拉姆负责起草第一稿。我没有参加第一稿的讨论和决定这篇稿件后来的命运。只是当赫希伯格恳求我把那段关于对群众阿谀奉承的话写下来，以便加到文章里去时，我才答应下来。尽管我承认文章中的某些个别的批评

是合情合理的或值得一提的，可我认为还有一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也十分怀疑这种大杂烩似的批评文章是否妥当。

它在党内从未得到过完全的赞同，相反，却触怒了许多同志。当赫希柏格在我的敦促下于1879年秋在伦敦拜访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恩格斯批评他说，这篇文章对于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赫希柏格写信告诉我说，无疑施拉姆曾在文章中加进了连他也不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十分温和，尽管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党对非常法的颁布负有部分责任，但却仍不能阻止第一个获得一份《年鉴》的德国当局——施瓦本和诺伊堡的巴伐利亚王国政府禁止这一刊物，理由是该刊物“以危害公共治安，尤其是危害人民各阶层和睦的方式表现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旨在颠覆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意图”。当出版商费迪南·克贝尔对这一根据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颁布的禁令提出申诉时，帝国委员会起初给他规定一个期限进行书面辩护，后来以“不许可”三个字加以驳回，它的解释是，只有依照法律第十三条须将禁令通知其本人的人员，才有权对禁令提出申诉。而法律第十三条则规定：“如这些人员在国内”。同样，由出版商本人通过完全合法的途径寄给他在德国莱比锡的代理商的四包《年鉴》，也在林道被扣留并遭没收。出版者在年鉴第二期发表的一篇关于被禁止一事的评论中并非毫无道理地写道：“这样一来，外国出版商在这项法律面前就毫无权利了”，接着写道：“倘若同这样一项法律相比，把恢复书报检查制度称之为一种进步，那就肯定不是什么过甚其词了。即使俄国的出版条件对于外国书籍出版业也还要更为有利。”

但德国书籍出版业却对此保持沉默。

（李进军译）

十五、《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立

即使到那时还坚决反对在国外创办一份党刊的那些生活在德国的领导同志也意识到，若是没有一个摆脱了德国警察的镇压、并使在德国和旅居国外的同志能经常了解党的政治立场的刊物，党将一事无成。如同侨居苏黎世的其他德国同志一样，我也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住在汉堡的奥艾尔，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和奥古斯特·盖布仍旧有一个时期对此不很感兴趣。后来，当他们由于上述情况同样也确信党在国外创办一份这样的刊物的必要性时，盖布则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出版一份油印的通讯稿。奥艾尔认为这一想法非常实际，便写信告诉了我们。赫希柏格表示同意，可能也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莱比锡。这时，正好倍倍尔从莱比锡写信通知我们，他和李卜克内西以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其他成员打算在国外创建一份党的周刊，并认为苏黎世是合适的地点。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写道，苏黎世的“人们”对他和同事们提出的建议报之以一项“反建议”，即“出版一份油印的通讯稿”，这种说法恐怕就是赫希柏格的那封信引起的，只是我并不认为“人们”这个词用得恰当。它给人以印象，好象这个反建议是由我们当时侨居苏黎世的人共同提出来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倍倍尔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苏黎世的人们最后虽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实施它的劲头却不大，但我认为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苏黎世人故意拖延此事，那是错误的。当时有许多事情妨碍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还在我们苏黎世人被授权着手做此事之前，赫希柏格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不得不去海滨浴场疗养，他在这次旅行中到了奥斯坦

德。从那里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返回之前需去伦敦几天，处理一项商业上的事务，届时将住在伦敦兰厄姆广场旁的兰厄姆饭店。接到此信时，前面已提到过的戈特弗里德·金克尔刚刚来访问过我。于是，在寄往伦敦的一封信中，我告诉赫希柏格说，虽然这位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老革命者在我面前自称是我们事业的朋友，但他的谈话中尽是些华而不实的空话。我接着又写道，“我可以想象，同卡尔·马克思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交谈将会迥然不同！”赫希柏格明白我言下之意，答复我说，既然他已在伦敦，假如我坚持的话，他将去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他随后就这样做了，虽然没有见到正巧外出旅行的马克思，但至少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把他请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实际上同他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无疑，这次谈话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我同戈特弗里德·金克尔的谈话，但对赫希柏格来讲，却绝对不能说是一次愉快的谈话。恩格斯拿起赫希柏格寄给他的年鉴，翻到署名为三颗星的文章，斩钉截铁地说道：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立足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就会同一个容许对自己说出这些话并承认这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切的党脱离关系。赫希柏格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于是，围绕着文章中的主要论点爆发了一场争论。恩格斯在争论中多次失去克制。若是赫希柏格对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比较了解的话，他也就不会对恩格斯的举动见怪了。单是从分手时恩格斯邀请他下次再来这一点，他就应得出结论：恩格斯对这篇文章的产生经过不甚了解，并把它认作是一项纲领性声明，他的尖锐批评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上的和解。然而，他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写信告诉我说，从恩格斯对文章的指摘可以看出，他和马克思对德国的运动的实际状况毫无了解。

赫希柏格回来后不久，保尔·辛格尔也来到了苏黎世，他受盖

布去世后担任党的领导的莱比锡三驾马车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的委托,与我们商谈创办党的周刊一事。他要卡尔·赫希柏格、被逐出柏林的党员同志卡·奥·施拉姆和我组成一个负责监督周刊的业务和编辑工作的地方委员会,并就能否担任编辑一事同卡尔·希尔施同志,其次是同曾任已遭禁止的德累斯顿地方党刊编辑、眼下暂住波希米亚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进行商洽。辛格尔得到了我们的热情支持,尤其是赫希柏格,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负担筹办刊物时所需的一切费用,直到刊物经济上独立为止。如果说熟悉业务的卡·奥·施拉姆认为9月1日就出版第一期刊物毫无可能,而建议把时间改在10月1日的话,那么这样推迟一个月与在创办刊物时所表明的原则性态度毫不相干。单是同卡尔·希尔施就担任编辑一问题进行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就要比人们在莱比锡所预计的要多得多。赫希柏格和我不停地与希尔施交换信件,而后者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最后,正如人们在倍倍尔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的那样,不仅使倍倍尔,而且也使曾推荐希尔施的李卜克内西对此人感到十分讨厌。我对他的行为也感到非常生气,我给他写信时的措词也越来越使他可以更加容易地以这些信为借口来拒绝担任编辑了。相反,赫希柏格依旧重视对他采取尽可能彬彬有礼的态度。一天,我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

赫希柏格(把一封我写给希尔施并让他先过目的信退还给我)说道:“这是您的信,您实在是太粗暴了。”

我说:“请您给我指出任何一个粗暴的字眼或句子,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改掉它。”

赫希柏格说:“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您的措辞直接就很粗暴,而是认为,您不够客气。”

我说:“我把希尔施看作党员同志,自从认识他这些年来也一

直是这么看待他的。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客套话来削弱在我看来必须对他说的实话。我想我没有一处违背了礼貌。”

赫希柏格说：“我并不是责怪您这一点。就让信这样发出去吧，也许会有它的好处。”

我说：“同意！”

这封信只字未改地发出去了，至于是否因为它而导致希尔施最终说出一个不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当这个不字传到苏黎世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此事与围绕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展开的争论没有关系。因为为我们所欣赏的福尔马尔当时正站在党内左翼一边，他本人在信中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与约翰·莫斯特是至交，所以还在他决定担任新刊物编辑的那几天就把此事写信通知了后者。只要莫斯特当时稍微理智一些，此信就会是两个刊物和平共处的一个开端，然而，莫斯特这人固执己见。

当福尔马尔接到通知，告诉他最后已被选中去苏黎世担任编辑职务时，他首先前往莱比锡，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就刊物中如何对待有关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然后来到了苏黎世，他受到我们大家的热烈欢迎。此时，我们已请来曾在德累斯顿为该地的党报担任过发送员、当时正在苏黎世政治避难的排字工人阿道夫·乌勒为新创立的刊物担任最初一个时期的发送工作。一位瑞士同志、独立开业的装订工奥古斯特·赫特尔承担了以出版者身份登记注册的任务，与此相联系着的便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我们在城郊霍廷根的上沃尔夫巴赫大街拐角处的一所房子里租下了底层的一套房间，作为编辑部和发行处。1879年9月28日，由福尔马尔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问世，报纸的名称是由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决定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历史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也无须再一一

重复。乌勒找到一位家住瑞士边境地区克罗伊茨林根的名叫约瑟夫·贝利的鞋匠，负责把报纸偷运进德国。这位积极热心的同志既十分巧妙而又非常谨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自《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寄出之后，德国各地便纷纷寄来订单要求订购该报，其中一部分是个人订户，另一部分则是负责在当地的同志们中间销售报刊的整个地区的代表。尽管当时的发行量还远远低于以后几年达到的高峰，但已足以使对类似这样的发送工作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乌勒力不胜任。于是，倍倍尔和福尔马尔让商业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尤利乌斯·莫特勒接管了发送工作。莫特勒曾于1874年和1877年在萨克森的茨维考—克里米乔选区两度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在1878年发生暗杀事件的夏天的那次选举中落选。他于11月来到苏黎世，同妻子一起在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那所房子里租下一套不大的房间。他给发送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气，并在旅居苏黎世的社会主义者中建立起一个社交性团体。该团体不仅采用了柏林摩尔人俱乐部的名称，而且也继承了它的精神。

(李进军译)

二十一、取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谅解

在奥古斯特·倍倍尔踏上返回德国的归途之前，我同他曾有一次谈到我们这些流亡苏黎世的人同在伦敦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师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不能令人满意的关系。虽然在1880年5月，威廉·李卜克内西就已经按照卡尔·赫希柏格的意愿并由他负担路费，前往伦敦，在侨居伦敦的两位大师和我们之间进行调解。关于这次拜访，他向我们作了一个印象极佳的

汇报，因此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在同约翰·莫斯特的信徒们进行论战的时候，有一天曾借此机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党所遵循的并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所捍卫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此，他们也将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所表示。可是伦敦的两位大师却通知苏黎世方面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我向倍倍尔谈到这事时，他付之一笑并说，他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李卜克内西对外面发生的冲突进行斡旋时，这是常有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惯于分别同发生争论的各派领导人，乘饮啤酒之兴就地进行友好谈话，劝告他们要保持冷静。这些人出于对他的尊重而采取克制态度，所以他总是满意而归，以为那里的一切现在该完全顺顺当当的了，可往往是，他刚刚转身离开，一场更加激烈的大吵大嚷便开始了。很可能，他在伦敦向两位老人把德国党内的思想状况描绘得过分好了，而事实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有必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两位老人。倍倍尔还说，如果能腾出时间的话，他年底前将前往伦敦，以使他们明白实情。当我表示愿与他同行，以便为改正伦敦两位大师对我们这些流亡苏黎世的人的印象尽自己一份力量时，他说这样很好。他还同赫希柏格、福尔马尔讨论了这项计划。于是，同年12月初，他果真实现了伦敦之行，赫希柏格同意给我路费陪同他前往。

在我撰写的《我的流亡岁月》一书中，我把“在伦敦”一章的一部分篇幅专门用来描述这次伦敦之行以及我们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晤谈的结果。这里只需要重申，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即取得创立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位大师的谅解，业已完全实现。为此，甚至无需进行一场特殊的理论争论。倍倍尔和我，由于恩格斯发表反杜林的论战文章，已完全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比其他一切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优越，因此，我们同两位老人进行的涉及社会主义运动

的谈话，几乎仅仅围绕党的实际的鼓动工作和政策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这一方面，倍倍尔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证实，在德国的某些有影响的党的领导人对市侩阶层所做的让步要比我们这些在苏黎世的罪人大得多。我现在只能把我在《我的流亡岁月》一书中所写的这段话重复一遍，即倍倍尔“当时风华正茂，他以自己的坦率和对德国状况以及党内情况所作的详尽说明，打动了两位老人”。

然而，他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评价是否都恰当，仍旧是可以怀疑的。比如他当时对德国经济状况的描述，无论如何要比后来的体验所证实的悲观得多。他在这次旅行中代表自己的商号同一些商人进行谈判，他们感到市场情况改善的前景很渺茫，经常为此发牢骚，倍倍尔在叙述问题时就把这当作依据了。而且由于他将这些牢骚解释为无意中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作的预言，他便从中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将迅速崩溃并会相应出现令人鼓舞的社会主义运动前景的结论。因而，在他的言论中，在十分清醒地估计党目前能实现的可能性的同时，却流露出对党的前途的非常诱人的乐观主义。当我们同两位大师告别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对他表现出尊敬和喜爱。而他们对我的态度则表明，他们并未把我看作象某些人（这里可不指名）向他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骄矜的沙龙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献身于社会民主党实际宣传鼓动的战士，在写作方面决没有任何自负。由于我将经巴黎返回，马克思委托我向住在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博学多才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阿塞·梅萨代为致意，我当然也去探访了他，他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印象。我同保尔·拉法格这位法国社会主义最著名的思想领袖，在伦敦马克思家里就相识了。当时，倍倍尔和我有一天应邀在马克思家吃饭，借此机会我们除认识了已经病重的马克

思夫人外，还认识了他们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和二女儿劳拉·拉法格，而我们同他们的最活泼可爱的小女儿爱琳娜在恩格斯那里就认识了。

当然，我在伦敦也同在那里落户的被驱逐出柏林的人们进行了接触，其中曾负责木工协会柏林分会工作的细木工人罗伯特·莱姆克成了我的挚友。应他们的要求，我在踏上归途之前，在未倒向莫斯特一边的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第二支部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特殊原因，实现这一诺言使我感到并不很轻松。

在这期间，有一天保尔·辛格尔因商务来到伦敦，他拜访了马克思，当他看到倍倍尔和我在那里时，便邀请我们所有人，即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卡尔·希尔施和我，到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克莱蒂伦饭店共进丰盛的午餐。我们在那里聚会良久，随后一起到外国人常去的皇家咖啡馆。在那里，我坐在卡尔·马克思身旁，并随即同他进入一席非常吸引我的政治谈话。可是这时，该我做报告的时刻就要到了。大家会与我有同感，当时要从马克思那里脱身走开，对我来说是并不容易的。一位同桌的人大声劝我说，尽管安心呆着好了，在这样的俱乐部里，原先已宣布的报告进行与否都无关紧要，他这番话使我更加感到为难。我已非常习惯于把各种集会看作是无论如何不得随意弃置不顾的事情，不能由于他这样说就偏离党的道德准则，因此我便向马克思和其他人表示歉意并奔向俱乐部。我感到满意的是，那里的大厅座无虚席，至少从为党进行宣传的观点来看，举行这次集会是值得的。

事后我得知，马克思对我中途跑开根本不见怪，而且表示非常赞许。当我在动身的这一天同倍倍尔单独坐在车厢内时，他借我就一个非政治性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对我在伦敦的表现表示满意，

并愿同我建立亲密友谊，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两人在归途中渡过海峡时未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我们在加来分手，之后，他经布鲁塞尔返回德国，而我先到巴黎，在那里作两天逗留，拜访亲近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参观卢佛宫和一些博物馆，然后前往苏黎世。

(刘敬钦译)

二十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

在同福尔马尔、莫特勒、赫希柏格、考茨基和施拉姆这些朋友们的一次聚会中，我首先向他们报告了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儿受到的亲切接待，报告了倍倍尔就党在德国的真实状况所作的客观描述，对两位大师评价我们这些流亡苏黎世的人的行动所起到的良好作用。他们高兴地听取了我的报告。唯独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福尔马尔，他的态度异常冷淡。此后不久，他在又一次聚会中通知我们，他不得不暂时离开苏黎世。莫斯特在《自由报》上告发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的军人养老金因此受到威胁，而他却不能缺少这笔钱。因此，他想在巴黎住一些时候。考虑到对他来说立即迁居巴黎是至关重要的，我表示愿意暂时代理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职务。对此，他愉快地表示同意。正象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80年12月4日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所谈到的，他在数周之前即已提请莱比锡党的领导解除他的职务。对这件事，我们当时一直一无所知。我也以为，他那次提出辞职并不是特别认真的，用不着恳请他便会答应继续留任。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他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处于对立，因此也就没有再恳请他。于是，他便利用这次约翰·莫斯特告发性的攻击，在我们面前把他这次离开

苏黎世解释为是这次告发的结果。但是倍倍尔后来写道，早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已经考虑我作为福尔马尔可能的接班人，而且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还邀请我陪他前往伦敦。我认为这是他因一时疏忽而记错了。我既没有接到他的这一邀请，他在我们一同前往的整个期间，一句话也没有向我谈起那样一种可能性，而在我们离开伦敦后的途中，本来是最有可能谈起的，因为在这一期间，他同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并毫无保留地同我交谈了有关党的事务。再者，直到那时，我从未证实自己承担得了报纸编辑的职务。而对于我能否长期接替福尔马尔的问题来说，这一点却是尤其应当予以考虑的。但倍倍尔在写作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时，却因疏忽而一再出现这种差错。在我最后几次拜访他时，有一次他向我诉苦说，他在他的工作中必须“特别”留神不让他的记忆力来捉弄他，并给我举例说，他刚刚找到一封李卜克内西的来信，说明后者因被监禁而无法参加一次讨论会。而他却曾经发誓说，李卜克内西是与会者之一。在象倍倍尔这样的从事多方面工作的人那儿，出现这种差错是不足为奇的。确定这种差错绝不包含对他的责难。因此，我更正他的这一差错将会得到原谅。这个问题看上去虽然无关紧要，然而，它对于说明我的发展过程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1880年年底，福尔马尔在他事先已编辑完《社会民主党人报》新年度(1881年)第一期之后，即动身前往巴黎。我的编辑工作是从这一年度的第二期开始的。我在这一期报纸的开头发表了社论《国家援助吗?》一文。这篇社论指出，当时仍十分流行而且特别为法国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所鼓吹的把国家援助同社会主义等同看待的说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社会民主党为澄清政治思想起见，必须极其坚决地加以反对。这篇文章以及这一期的其他内容(不单是由我撰写的文章，也包括威廉·李卜克内

西及其他人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几期也是如此。因此莱比锡党的领导机构对由我暂时接任编辑工作表示同意。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不象在福尔马尔主编的时候那样冗长,这点一再受到称赞。福尔马尔的文风固然优美明快,但它追述往事往往不着边际,以至于使人们,象伊格纳茨·奥艾尔所说的的那样,每读他的文章就总是要想起那些挥舞大刀的胸甲骑兵。我尽力想避免这种缺点,在这方面,我得到一些精明能干的同志作为撰稿人的帮助。当然首先是李卜克内西。至于曾考虑让他担任主编这件事,并没有告诉我。因此,我始终把他仅仅视为权利平等的编辑。这还从来没有使他感到不快,因为我把他看作一位有功绩的先锋战士和在各个领域知识渊博、并且具有一种十分流畅活泼的文风的老同志,自愿地对他尊重。在编辑工作中,我们之间也从未发生过真正的争吵。仅仅在一个方面我对他不大尊重,这就是把他那些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恰当地毋宁说是肆意对待事实的评论悄悄压下发。这个行笔如神的人难得发现这些事情,不过毕竟有时还是发现了。他对此提出责问,于是我只得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为了不把他的功劳记在我的名下,或者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为了不给德国的检察官留下对他起诉的口实,我通常把他撰写的社论署名为“塞利姆”。这个词同他在我们圈子里的绰号“士兵”一词即“米勒斯”^①,在字母的排列次序上正好相反。此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撰稿人是卡尔·考茨基。他的文章最初大都署名为“辛马霍斯”,这是希腊文的“战友”一词。我有时也给这些文章署上J—r的标记,这是他的绰号尤赫策尔^②的缩写。这个绰号是尤利乌斯·莫特勒为赞扬他为苏黎世摩尔人俱乐部那

① miles,拉丁文“士兵”之意。——译者注

② Juchzer, 德文“欢呼声”之意。——译者注

些愉快的晚上立下的汗马功劳而赠送给他的。在一段时间里，被驱逐出柏林的卡·奥·施拉姆提供了一批为人们爱读的文章。但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却同卡尔·考茨基和我发生冲突。从那以后，他不仅同我们，而且也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了友谊，同时停止为党工作。

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其他固定的撰稿人。一些偶而撰稿的人的文章我有时是用笔名发表的。遗憾的是我无法指出这一大堆笔名所代表的真名了。凡我认为应在政治上给予重视的由我撰写的文章和评论，我通常署名为“莱奥”。这是从前在乌托邦团体中别人赠予我的大学生绰号“厄尔”的倒置。在一些情况下我也署名“维特利乌斯”，这是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条街道的别名的改写。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格奥尔格·福尔马尔 1882 年夏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那一年 8 月 17 日和 8 月 24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用一个天平的标记署名，并引起相当的重视。文章论述了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并宣称，想有朝一日通过议会途径摆脱这个非常法是没有希望的，社会民主党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将其废除，对这一认识，党必须在言论和行动上作出明确表示。在 1881 年 10 月 27 日的国会选举中，福尔马尔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在当时萨克森第十五国会选区（米特魏达—弗兰肯堡）被选入国会，他那时尚未重返德国，因此，对德国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他对倍倍尔成为他的批评者感到吃惊。倍倍尔十分坚决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 年 10 月 12 日那一期）上反对他涉及党的策略的那些结论。

不过，这篇文章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 1882 年 9 月 13 日写信给我说，他推测此文的作者是倍倍尔。“如果不是他，那末党就可以庆贺自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人，他非

常善于洞察事物本质，抛弃一切次要考虑，同时写得非常简洁明了”。^① 在倍倍尔的反驳文章发表之后，他在后来给我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赞扬作了限制，说这仅仅是无保留地对文章的第一部分而言。第二部分他“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他“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四个人在闲谈”。^② 否则，他就不会对它（指文章）在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语言如此掉以轻心了。倍倍尔在这点上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又继续写道，“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③ 恩格斯 1882 年 11 月 2 日又继续写道，“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④ 此外，福尔马尔又用“祖尔图尔”的笔名将那篇文章在霍廷根—苏黎世大众书店的代理出版社作为政治性小册子发表，用的书名是：《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吗？谈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那时，恩格斯同我保持着频繁的信件来往。他在 1881 年 2 月 2 日的来信中向我表示了他对我采用的调子的满意心情：“调子变得流利而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的勇气。”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通信尽管偶尔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却变得越来越亲切。我在主持编辑工作三个月之后，于 1881 年 4 月初在寄往莱比锡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我感到由我担任党的机关报编辑的职务还欠缺一些什么。我请求党的领导，如福尔马尔不返回苏黎世的话，应考虑最后确定委派别人担任这一职务。我把这一请求也通知了恩格斯。他在 1881 年 4 月 14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6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388 页。——译者注

③ 同上。——译者注

④ 同上，第 387 页。——译者注

日的信中对我说，我想要辞职的声明使马克思和他很不愉快和非常吃惊。他又继续写道：“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将**非常高兴**（着重号是他加的。——伯恩施坦注）。您一开始就很善于编辑报纸，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并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① 不难想象，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位大师的这一声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当倍倍尔受莱比锡的同事们的委托写信告诉我，他们不认为需要进行人事变动，并请求我留任时，我认为必须满足这一权威方面的恳求，于是撤回了我的请求。此后不久，在1881年的夏天，那时已在狱中服刑几个月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来到苏黎世，打算在这儿休养几周。他让人把由我编辑的所有各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交他查阅，此后他同样向我表示赞同我在报纸中所坚持的立场。同倍倍尔一样，他也同我——我记不太清楚是当时或是在此后不久的一次访问中——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非常谨慎而熟练地领导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业务管理和发送工作的尤利乌斯·莫特勒，表示了减轻我的编辑工作负担的最良好的愿望。他虽然有这种最良好的愿望，却反而加重了我的工作。从福尔马尔还担任报纸编辑的那个时候以来，除其他报纸外，称得上是德国内容最丰富、编辑得最好的报纸之一的《法兰克福日报》也在沃尔夫巴赫附近的地区发行。在那儿，莫特勒是首脑。报纸总是在发行几天之后才送到苏黎世交给我，因为莫特勒自己先要浏览一遍。他认为，补救这一点的做法就是把凡他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地方用彩色铅笔作上标记。然而，因为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同我的眼光都不一样，而他作上标记的地方常常是多得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5—176页。——译者注

可怕，这样，我只有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这份大报浏览一遍。然而，我不想伤害这位为党作出如此多的贡献，年龄和党龄都很长，既敏感又感情细腻的同志，因此，便对这事听之任之。由他编辑的《发行部信箱》一栏确实充实了报纸。他喜欢在这一栏中发挥他对冷嘲热讽的爱好。由于日益疯狂地向党进攻而被取名为“轰轰将军”的约翰·莫斯特时常可以在这一栏中看到对他的冷嘲热讽。莫斯特在反对他曾在其中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党这一点上陷得有多深，以下事实便可说明：他在1881年国会选举前夕，曾要求他在德国的同党尽一切力量不让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选入国会。

我个人认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由编辑部负责的栏目里同莫斯特进行任何论战，只不过是浪费版面而已。为了不使我犯这种浪费的错误，我对自己耍了这样一个花招，总是在《自由报》出版三至四周以后才把每一期报纸阅读一遍。这时该报对我们的猖狂攻击所起的那种引诱我们进行还击的作用已经减少到零了。在莫斯特偏离到无政府主义阵营之后，我有时力图在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的文章中，运用我的批判才干对他在《自由报》上的论调进行客观的评论。

俄国的革命社会党人用炸药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获得成功，这件事使我在思想上过分相信炸药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威力，这时我首先遭到本党同志们的攻击。对于沙皇的可怕的死亡，我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我把弗莱里格拉特《冷宫》一诗中的诗句刊登在这篇文章之前：

“直到三月方可瞥见它那壮丽的景色。

然而——在俄国，

春天也正在来临，

涅瓦河亦在冰雪消融！

而你们将要被吞噬！”

我把这次谋杀说成是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的必然结果。但我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后几期发表了几篇警告性的评论，宣称德国社会主义的迫害者也不能担保不受到炸药的报复。由于这些评论的缘故，我有一天收到威廉·哈森克莱维尔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受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党团的委托，向我表明他们反对那些评论，因为它们似乎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携带着炸药包东游西窜”。虽然这一通知仅仅是根据只有十二名成员的党团的多数决议，不过我对它却是重视的，因为在非常法的情况下，党在国会中的代表机构必然同时也是党的领导机构。然而，为了恰当地表达德国那些受反社会党人法压迫的同志们的感情，总的说来我没有怎么改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调子。从那以来，我还曾多次同多数国会议员发生过冲突。

当1881年12月国会开会讨论关于实施小范围戒严状态的报告时，两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布洛斯和威廉·哈森克莱维尔拒绝罗伯特·冯·普特卡默大臣提出的要党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的苛求，他们的措词可以被理解为否认同这个由维登代表大会确定为机关报的报纸有任何政治联系。于是我认为，对这种拒不承认的做法必须加以反对。文章发表在1881年12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在一篇署上我的武士般的绰号“莱奥”的题为《非此即彼》的文章中，我声明，如果允许党委派的代表拒绝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全部立场负责的话，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称号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我又补充道：

“我们不是这样没有骨气，以至于想维持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如果党不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那么它就可以撤换编辑。

但是，不假思索地任人否定它自己建立的机关报，这同政治荣誉的最起码的概念是相互矛盾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不可能想象，从它被安排在自己的岗位的那一时刻起，它就会突然一下子体现党的全部政治认识……它决不要求它的每一行文字或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党的权威，但它可以而且也必须要求党对其一般的原则立场承担政治责任，既不多，也不少。”

文章说，在那年3月31日的国会会议上，倍倍尔同志以“最明确和毫无保留的方式”坚持了这一正确立场。……所谓“我们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字表达方式负责”的声明，如果不是想对它的编辑部踩上“一脚”的话，那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极为卑鄙的机会主义”。不管怎么说，这种机会主义使党受到敌人“理所当然的讥笑”。

可以想象，他们对这些阐述并不是一直未作回答的。遭到如此辛辣攻击的议员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几次发表声明，声称他们绝没有意思要否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性质。德国各地党的支部给编辑部寄来了声明，无一例外地对它表示支持。党的国会党团商定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在所有要点上满足了我在以上摘引的文章中认为是绝对必要的那些内容。这项声明刊登在1882年2月16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头条位置上。全文是以下述这段话结束的：

“我们毫无保留地承认自从存在以来便尽一切可能努力完成它的这一任务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对它的每一篇文章或每一个措辞承担责任。对过去的党的各种机关刊物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责任问题，而今天，在报纸的出版地点已经使得在德国的党员同志们不可能具体地施加直接

影响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存在这种责任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所要求的和能够明智地要求的，而且也是我只要求的。因为如果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承担任何责任，实际的后果就会是限制思想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在我看来是党的机关报的编辑进行有益的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在声明上签名的同志有：伊·奥艾尔、奥·倍倍尔、威·布洛斯、约·亨·威·狄茨、卡·弗罗梅、布鲁诺·盖泽尔、卡·格里伦贝格尔、威廉·哈森克莱维尔、麦·凯泽尔、尤·克雷克尔、威·李卜克内西、威·施托勒和格·福尔马尔。

共十三人，而国会党团只有十二名成员。但是党团由于正确地考虑到党的政策的需要，请奥古斯特·倍倍尔参加他们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倍倍尔 1878 年曾在萨克森的两个选区当选。同年，他放弃了对他来说万无一失的格劳豪—梅拉内选区的议席，而接受了只是在决选投票中才获胜的德累斯顿—阿尔特施塔特选区的议席。但在 1881 年的选举中，他被那里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击败了。那时，在关于党的策略的有争执的问题上，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福尔马尔以及党的两三个不如他们著名的国会议员和我之间，通常意见是一致的。相反，在伊格纳茨·奥艾尔和我之间，却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

就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机关报达成的协议实际上不过是解决了一个形式问题。在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更加尖锐了。尤其支配着倍倍尔的一种看法是，德国商业境况不佳不久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大崩溃，它在政治上的反作用很可能是群众的革命起义。这一看法当时得到我的赞同，并促使我采取符合这种崩溃的凭空想象的言论和政策主张。但党的大部分国会议员对我们近期的未来前景设想得并不那么乐观，

并因此认为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言论不如说是有害的。与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联系起来，深入地交换意见看来是合乎众人的愿望的。这样，党的领导计划在1882年8月中旬到苏黎世召开一次有党的代表和特邀的受托人参加的代表会议，以便尽可能就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如期举行了，并发生了争论，各种思想不时地比较激烈地相互交锋。但是在如何对待党的策略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相互理解。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于1882年8月24日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用黑体字刊登了如下通告：

“致党员同志们！

自从维登代表大会以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同志们对这些问题的评价有一部分是很不一致的，尤其是最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曾一再提出，在年内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因此有必要召集党的议会代表和一批受托人讨论这一事情。以上代表于8月17日至20日在苏黎世举行了会议。我们将这次讨论中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公之于众的内容简短公布如下。

在三天讨论中业已解决的议题有：

策略问题，组织事务，改进传单散发工作，党的机关报的地位和立场，德国报界的态度，建立党的档案馆，财会事务，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以及一系列各种事务、提案和申诉等等。

首先，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一个可喜的事实，尽管在讨论有关党的机关报的策略和立场的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看法，但这些看法只是从是否有利的角度提出来的，而决没有出现真正的意见分歧。关于建立党的档案馆的提议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于来年春季召开，希望同志们能利用开会前这段时间，使代表更具有普遍性。各方面都表示确信德国社会

民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和全力以赴地迎接向它提出的任务，不管艰难险阻，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1882年8月底于德国”

结尾的签署是让国内熟悉情况的人注意到，这个通告不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是由在德国的党的领导机构发布的。可以看到，它本身就是领导机构中右翼和左翼代表合作产生的妥协的作品。首先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必须对有争议的党的政策问题保留最后决定权。通告在最后指明于1883年春天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我的编辑工作受到布鲁诺·盖泽尔的严厉批评。但这些批评并未涉及原则问题，而只涉及到报纸的调子和语言。他把拉萨尔富有生气的语言作为样板同报纸的语言相对照。我记得我回答盖泽尔说，我无意同文体家拉萨尔比个高低，但我必须强调，《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处的战斗岗位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同那时的拉萨尔不一样，因此也就不可能使用同样的语言。其他人没有介入这场争论。

相反，《社会民主党人报》恰恰是在1882年8月17日，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的一期上，在头条位置发表了上面提到的福尔马尔文章的第一部分。这篇文章同党的右翼中流行的观点进行论战，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当期待，也不应当哪怕只是希望，在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即将期满时不再延长此法，而是通过使普通刑法的某些条款变得更加严厉来取代它。如果说这已经是暗示此文的作者认为党必须使用比迄今为止更加激烈的言辞和执行更加激烈的政策，那么，一星期以后发表在1882年8月24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这点。文章开头大致这样写道：“社会民主党人摆脱今天的国家和今天的社会将越来越彻底，我们同我们的敌人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深，日益扩

大,并越来越难以逾越。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四周布满敌人,我们同这些敌人只有一种关系可言:敌视和战争……”“……因此,我们的口号不是:打倒卑鄙的非常法,而是:打倒使这种非常法成为可能的卑鄙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今天,社会主义事实上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过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议会得到解决,而只有在大街上,在战场上才能解决……”“我们的每一个战士和全体人民必须充满这样一种信念,和解与缔结和平是不会结束斗争的,而是,一切唯有用利剑来决定。”那些诸如什么“和平发展,逐步改造”,什么“唯一真正的”,即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我们身在其中的……”革命等等的“既无聊又有害的词句”必须停止使用。“让我们把一切躲躲闪闪,秘而不宣,摇头否认和装模作样看作是同我们的身分不相称的。让我们公开地、倔强地朝着我们的敌人大声疾呼:‘是的,我们是危害国家的,因为我们要消灭你们!不错,我们是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名誉、你们的宗教和你们整个制度的敌人。是的,我们是革命者……是的,我们将以暴力对付暴力!……你们提出了权力问题——好吧,我们接过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不久的一天决一死战,而胜利者将创造法律!’”

他说这是一个“最简便,最有价值,唯一符合情况的政策”……它必须“在党的一切行动中:在报刊中,在宣传鼓动中,在法庭上和和在议会中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成不变的准则。这样,我们的党又会是统一的,不可损伤的和强大的,它可以应付各种情况,因为任何情况也不会使它惊慌失措。”

应当承认,这段叙述在政治的激进主义方面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在会议召开前不久,福尔马尔短期迁居苏黎世,并把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交给我。我在还不清楚这篇文章最后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之前,便将它付印了。不过,当我收到文章

的最后一部分时，我把它拿给倍倍尔看，并发表意见说，我觉得这篇文章超出了应当明智地加以维护的东西。倍倍尔同意这一看法，并向我保证说，他将从德国寄一篇反驳的文章来。在他回到他的居住地点之后，他立即寄来了这篇文章。他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署名为B的答复，对福尔马尔文章的最主要的前提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并宣告他所阐述的政治策略是无法实行的。文中这样写道：“作者是否考虑过，在目前这一时刻，象他所鼓吹的煽动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并且不相信他认为自己譬如说在国会的讲坛上用他所提倡的腔调说话是合适的。”

福尔马尔毕竟也没有这样做。1882年12月13日，他和卡尔·格里伦贝格尔代表党对政府关于小范围戒严状态的报告发表意见。这两名发言者的语调都比非常法实施以来人们从社会民主党方面所听到的语调更加严厉。但是，福尔马尔毕竟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超出强调倍倍尔和他一道表示赞同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目的，因此，我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毫无保留地向他表示赞赏。普特卡默大臣试图通过引证社会民主党颠覆性趋势的言论来削弱福尔马尔发言的影响，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一企图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批判，恩格斯1883年1月18日代表他自己和马克思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的回答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①几个月之前，1882年9月13日，他曾就考茨基从维也纳写来的一封信，向我写信说：“他断定说，他在那里发现几个出色的哲学博士。如果他们确实出色，他们会很受欢迎。”^②

至少这点完全符合其中两位“博士”即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57页。——译者注

亨利希·布劳恩博士的情况。两人都久经考验而被证明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多得的新一代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作为组织者和领袖，在把软弱涣散和四分五裂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建设成为一个团结一致和深孚众望的党这件事上，功绩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得多。亨利希·布劳恩则主要是一些以社会政策为内容、态度谨慎的第一流杂志的创办人和出版者，同时也是一些大部头的、对社会政策颇有研究的学术论著的倡导者。考茨基在叙述自己的生平事业时，对此作了描述。这段叙述是题为《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的论文集（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出版）中的一章。^① 1882年8月，当卡尔·考茨基来到苏黎世几天，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时，得以告诉倍倍尔和我，他正在创办一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杂志，这部分地也应归功于亨利希·布劳恩。

我们兴趣盎然地听取了这一预告。倍倍尔热情地支持考茨基关于请党内同志亨利希·狄茨承担出版杂志任务的计划。后者在斯图加特接管了一家规模不大、正在同破产作斗争的社会主义出版社。他既懂得审美技巧，又深知书籍出版业的商业上的要求，使得这家出版社很快发展起来，获得了生存能力。实际上，考茨基在狄茨身上发现了一位十分懂得珍惜著作界给予自己的信任、并证明自己没有辜负这种信任的出版家。杂志争取到威廉·李卜克内西充当固定的政治撰稿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亨利希·布劳恩和其他一些才华出众的同志也答应为它撰稿。1883年1月1日，《新时代。思想和公共生活评论》月刊第一期刊世，由斯图加特约·亨·威·狄茨出版社印刷出版。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讲，这是一件大事。迄今为止，它还不曾

^① 即考茨基的自传《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1930年出版了单行本。——译者注

有过一份如此明确的学术性质的期刊。然而，对于这份新的理论知识刊物来讲，争取生存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容易。党仍处于非常法的压力之下。即使在符腾堡非常法的实施还不象在北德各邦那样残酷无情，可俾斯麦这一杰作的弹性规定却迫使人们处处小心谨慎，以至于在最初几年里，较有名望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敢以撰稿人身份公开署名。不言而喻，这给这一杂志的传播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中仍有众多的反对者。当《新时代》杂志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战斗刊物时，他们便转而对它采取了敌视态度。

在考茨基的领导下，它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战斗刊物。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助他一臂之力，会使我感到满足。可是，该报的编辑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使我在较长时间内无暇挥笔参加就理论问题展开的专门讨论。1883年11月，恩格斯同意我把迄今只有法文版的卡尔·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战斗檄文《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由于卡尔·考茨基不久就搬到苏黎世来往，我俩便合作把这篇著作的绝大部分译成了德文，其结果是，我从这一著作中所吸收的理论养料，要比当时在其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所吸收的多得多。

（曹白隼译）

二十八、党内围绕轮船公司津贴问题的争论

1884年10月28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改选给社会民主党带来选票的激增和议席的增加，再加上决选投票中的胜利，党从此在国会中的议席增加到二十四席。这不仅使党获得国会章程规定的一个公认的国会党团所享有的权利，而且使党在国会的各种表决

中，成为那些传统地站在政府一边的政党同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举足轻重的砝码。

党的国会实力地位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甚至那些迄今在国会的辩论中一味高傲地谈及社会民主党的政党，现在也对它有意客套一番；政府的代表人物同它的国会党团的领导成员接近，并同他们一道讨论不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性质的提案所涉及的范围，诸如此类的情况证明了对我们称之为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国会的居留权的承认。这对国会党团的某些成员影响颇大，以至他们意欲过分殷勤地按照常言所说的“投桃报李”来行事。

这时，党团在新的国会中，面临着不能依据迄今决定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简单公式加以解决的各种问题。正是这时，德国企图取得殖民地的运动开始成为实际政策的一个问题，并逐步得到较长时间以来对其持拒绝态度的俾斯麦的支持。首先，德国人在非洲取得的一些地区被宣布为帝国的保护领，可是，组成五花八门社团的殖民思想鼓吹者们的贪婪并不以此为满足，而在这些社团背后进行操纵的是形形色色的十分显要的人物和资本家。他们宣称取得殖民地对于实现各种各样的目的都是必要的，其中比如为放逐无法谋生的人和罪犯。来自汉萨同盟城邑大企业的代表们谒见俾斯麦，表示支持建立刑事犯流放地。因此，社会民主党有足够理由对这一运动采取严厉批判的立场。

1885年春，帝国政府提出一项提案，建议对德国各航运公司为承担快邮业务而开辟和经营通往非洲、东亚和澳大利亚的定期轮船航线给予津贴。提案只字未提同殖民政策的关系，但在旨在开辟通往非洲航线的计划中，这种联系显然存在。因而，党团一致决定，拒绝给予这条航线以津贴。反之，党团的多数打算同意给予其他航线以津贴，其理由是，这关系到促进互相交往的文化目的，

而工人们对此也是抱有兴趣的，况且对他们来说，必要地建造新的轮船则意味着大大增加德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党团的少数却打算同样加以拒绝，因为不仅上述各航线同样均有殖民政策的背景，而且只要不是为了牺牲一些航运公司而使另一些航运公司获得优先照顾的话（不来梅的北德劳埃德公司作为汉堡的竞争者应得到津贴），那么在无津贴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建立有关的通邮航线。党团内这一意见分歧的事实并未向国内的党员们隐瞒，因此在党员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他们绝大多数站在党团的少数派一边，属于这少数派的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和威廉·博克等颇有名望的人物。在各地，党的成员对国会党团的多数派感到愤慨，而这种愤慨在某些情况下发展到威胁的程度。

我本人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样表示一概拒绝关于津贴的提案，根据是这些提案同推行广泛殖民政策的运动有着内在联系。我曾想，不管现在如何解释，得到津贴的轮船航线只会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增加德国的殖民地，而德国占有的殖民地越多，被置于刚刚延长有效期限的非常法限制之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越应有准备，有朝一日，这一个或那一个殖民地会被用来作为放逐社会民主党人的流放地。只要社会民主党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我看来，它就不可能支持殖民政策，即使它对德国取得殖民地原则上并不采取敌对态度。对此，我在党的机关报上尽量采取了非寻衅式的表达方式，因为我决不想使另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蒙受嫌疑。

在这期间，党的一些较为强硬的代表人物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在党内颇有名望和通常并不属于过激派的被驱逐出柏林的亨利希·拉科夫，就向我寄来一篇针对赞同轮船公司津

贴的人们文章,对他们实际上以必要时开除出党相威胁。同时,威廉·李卜克内西给我寄来有关是否赞同津贴问题的评论,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这些评论虽然基本上意在和解,但由于表示支持拒绝津贴法案,被本来就对反对他们的运动感到愤慨的党团多数派理解为讽刺挖苦,使他们的恼怒有增无减。

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处,也就是莫特勒,在分发的报纸中,附寄若干份党的苏黎世支部印发的号召各地同志反对党团多数派立场的呼吁书时,冲突便趋于激化。于是,党团多数派于8月20日通过一项党团声明,竟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党团进行的批评是“不能容许的”,并说党的机关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党团采取反对态度,因为党的机关报的立场是由党团负责的。不是报纸决定党团的立场,而是党团决定报纸的立场。

这一声明由伊格纳茨·奥艾尔受党团委托寄给我,并指示将其在下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头条位置发表,却不许我对声明表示任何意见。该声明和禁止身为编辑的我在报纸上对声明发表意见一举,使我颇为激动。在我看来,这无非意味着要取消我思想上的独立性,而我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失去这种独立性。于是,我便坐下来给党团写了一信,该信我当时没有发表。由于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考茨基致我的论述这一争论的信件中涉及我的态度,所以我现将该信的主要段落摘抄如后。(参看《弗·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书信集,附卡·考茨基书信》,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164—172页。)

信中简短的开头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认为按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公布声明与党的原则是不相容的,接着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编辑部)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拒绝公布声明,由党团直接向同志们下达他们的有关愿

望或指示。

《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不是党团的机关报，而是党的机关报，只受前者的监督，因此，编辑部采取上述行动就更加是正当的。

当然，党的机关报随时可供党团用来对党的问题发表声明，可是，国内的同志们和编辑部若无权利在一件显然有关切身的事情上，必要时也能表示自己对党团的反对立场，则是闻所未闻的……

第二种办法是，编辑部虽在报上发表党团的公告，却同时在报上声明，它将辞职不干。

这种效果是否是党团作出决定时默认的前提，暂且悬而未决。但在这一情况下，若党团直接出面干预，而不是通过符合它心意的声明来嘲弄党的话，那么，从党的利益的角度来看，肯定会好得多……

因此，编辑部决不把公布声明——不管这项决定如何强烈地针对它——这一特殊问题看作是它自身的事情。但是，它不能下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件让党丢尽颜面的事情的同谋者，反之，它认为自己的义务是，使党团在最后决定立场之前，先注意到它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编辑部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若对一项大大有损于我党声誉的决议的全部影响加以冷静的考虑和设想，则作出这样的决定全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编辑部仍请党团对这项决定再次予以斟酌，特此附上声明抄件——该声明缺少通常在此种情况下自然必不可少的决议起草人的签字——和附函。

顺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此信被一些人看作是对党团的侮辱，我愿意承认此信会伤害它的感情。可是我写此信并不是为了向党团说一些令其感到尴尬的话。我是要向它着重说明，如果党团坚持其声明，我就不能以及为什么不能继续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我是非常郑重其事的。同日，我还曾写信给由美国社会党在纽约出版的《纽约人民报》的主编亚历山大·乔纳斯。1881年，当他在苏黎世逗留几周时，我曾同他有过十分友好的往来。我在信中写道，我可能不得不放弃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职位，并询问他，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是否可能托他在纽约给我找到一个新闻记者的工作。我从他那里得到回音说，一般说来，希望并不怎么大，但是我满可指望，必要时他将同我分担他的报酬优厚的编辑职务。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我的信使党团陷入一种窘迫之中，因为尤利乌斯·莫特勒原则上赞同此信。于是，党团便接受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提议，让他立即前往苏黎世，以迫使这些“流亡苏黎世的人”“就范”，并授于他采取某些可能必要的措施的绝对全权。为了恫吓我们，李卜克内西在苏黎世事实上首先对我们使用了一种非常专横的腔调。然而我向他指明，党团的声明不仅使党在全世界大为出丑，而且给予检察官和唯命是从的法官以求之不得的把柄，使他们能要留在德国的党的领导成员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这时，他向我承认，现在这种形式的声明是不行的，它应该采用使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思想独立性不容有任何怀疑的措词。

这就为取得谅解奠定了基础。李卜克内西于是拟就了党团声明的一个文本，它虽然尚不能令我满意，但这是也由他起草的关于党团和编辑部之间达成一致的通告的先声，因此我是可以欣然接受的。在这份通告里，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首先是党的机关

报,并因此有权对党团自由发表意见。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在1885年4月2日的一期上公布了由李卜克内西所拟就的党团声明的文本,并接着在4月23日一期的第四版上公布了在这期间递交党团并得到它赞同的关于我们达成一致的通告。对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通告在简短的开头语之后这样写道:

“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一致认为,在党内应存在批评的绝对自由,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企图将意味着对党的原则的背叛,并将动摇党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是,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也一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党的统一和行动能力,若借口行使自由批评的权利,试图给党的领导履行职责制造困难,对此则必须予以坚决拒绝。切不可忘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处于非常法的威胁之下,从而也就是处于一种紧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则需要对各种力量实行严格的集中,这一集中没有同志们的信任是无法实现的。党的代表机构若不能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就难以胜任所担负的艰难任务。党的领导若就某一事务作出决定,它就必须确信,同志们将以充分的信赖和全部的力量支持它。不管这个人或那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但他必须从策略上服从全党的代表机构,正如在这一代表机构中,必要时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一样。若不如此,任何组织和任何行动都将终止。正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为同志们提供了纠正国会党团滥用其受信任的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

在导致在党的机关报第十四期发表声明的争论问题上,国会党团确信,苏黎世决议号召同志们采取反对国会党团,即反对党的领导‘措施’,必将削弱党的领导行动能力,从而也将削弱党的行动能力。苏黎世的同志们否认自己曾有此意图,并将在下期党

的机关报上发表有关声明。但在任何情况下，国会党团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它未曾想到进行任何形式的压制，但它也不能容许对自己有任何形式的压制。它对党所负有的义务是，始终一贯地履行托付于它的党的领导的荣誉之职，并回击一切攻击。

关于国会党团对待党的机关报的态度，将在今后几期党的机关报上予以讨论，今天只须说明：国会党团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看作是它本身的机关报，并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属于全党，是全党的机关报。但是，全党是由国会党团代表的，它由于担负党的代表机构的职责，当然有权对党的机关报进行监督。在这一点上，国会党团同党的机关报编辑部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那些导致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七期发表声明的事件，并未使这种兄弟般合作关系受到任何影响。”

但是，在党员同志们看到刊登这个通告的那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之前，就连经过李卜克内西修改过、措辞变得温和的、发表于4月2日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党团声明，竟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同志中引起强烈反应。因而，许多地方向《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对这项声明的程度不同的强烈抗议。其中首批抗议书，和上述通告一起，摘要发表于同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只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支部的一份详尽和精心拟就的抗议书，对早已接近于公开宣战的党团多数派大肆进行攻击。

后来，其它一些支部也步其后尘，为表明党的这个并非无足轻重的支部在当时的情绪，现特将该支部致国内党员同志抗议书的一些段落摘抄如下：

“我们对我国国会党团中一部分人所作的一切谴责，本来只是要指明一系列策略性的错误。可是，若把最近发表的声明与此加以比较，那么这些错误的性质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该项声明

仿佛是完成一个整体的一块威严的拱心石。你们大家都已读过了这项声明。

我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同志们把国会党团的这一声明看作是企图实行专制措施，看作是国会党团多数派企图将某种非常法引进我们党内生活。我们认为，这一声明的意图是对我们同志们自决权的肆无忌惮和闻所未闻的干涉，我们以本文件明确宣布党的这些代表们对平等原则进行了侵犯……

对声明的最后一段以及声明的调子，我们宁愿保持沉默，我们担心，盛怒将会搅乱我们的明断。然而，如果国会党团多数派深知他们的立场不可动摇，那么他们只要哪怕再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那时他们将会看到，无产者是善于区分良莠的！……

党员同志们，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将会明了，我们的一部分议员企图将我们的革命运动引入议会政治的泥潭之中，并力图将这一运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那么，你们就应向他们表明，你们事实上不仅摆脱了过去和现在的蒙昧思想，不仅摆脱了一切空话，而且摆脱了你们自己的所谓领袖，今后他们应当只不过是仅仅向我们负责的议员而已。”

这就是这份来稿的结束语，李卜克内西在按语中对它评论说：它充满——对此编辑部同国会党团意见完全一致——“憎恨情绪，这本来在党员同志中是不应产生的”，此外，“在许多重要之点上”，它背离了“党的策略和党的传统的基础”。

这份来稿的调子确实也使我感到厌恶，我本来是宁可请求法兰克福的同志们允许我把一些措辞缓和一下的，可是，出于种种原因未能这样做，而且由于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的坚持，这份抗议书连同李卜克内西写的按语原封未动地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这导致法兰克福同志们中少数人提出反对意见和奥芬巴赫党

支部寄来针锋相对的信；卡尔·弗罗梅曾在一篇书面声明中与这份抗议书论战，这篇声明曾在他未得知的情况下，由接近他的同志们提供给国家自由党的《法兰克福日报》发表，于是又引起了其它的争论。正如每场争执一样，这场争执没有所谓的决战也是不会结束的。如果说在国会党团多数派的成员中，有少数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斗争中不落得个一败涂地是不会甘心的话，那么，在反对派中则有为数更多的人希望，尽管国会党团在最后表决时拒绝了轮船公司津贴法案，但是倘若冲突能以开除一些人出党而告终，那是最好不过的了。特别是侨居国外的一些同志根本不甘罢休。不过党所要做的事情，比起由于内部争论而互相伤害来，要多得多。

(刘敬钦译)

三十六、《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 人员被逐出瑞士

1888年4月中旬，瑞士联邦委员会下令将《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人员驱逐出瑞士，被驱逐的有编辑即我本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负责人尤利乌斯·莫特勒、与《社会民主党人报》联系密切的人民书店领导人海尔曼·施留特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印刷所负责人列奥纳特·陶舍尔。

这件事来得并不突然。长期以来，俾斯麦的走卒们就在叫骂，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允许在瑞士的土地上制造和发射“毒箭”反对德意志帝国，在瑞士本土逐渐地也出现了同这种嚎叫遥相呼应的声音。此后在1887年春季，《社会民主党人报》开展了反对恐吓法国人的骗局的斗争以及《红色魔鬼》的出版，又勾起对方新的狂怒，于是联邦委员会决定对这些文章的作者和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进

行调查,并将此事继续委托给苏黎世州政府,调查的结果之一是,当时的州警察总监施特塞尔博士,一位既具有自由思想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参议对我本人进行了审问。因为调查主要涉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写作方式和斗争方式,所以我请求施特塞尔允许我用书面材料详加说明,他当即诚恳地答应了。由于联邦委员会在阐明驱逐的理由时引用了我所写的这份书面材料,所以我便在1888年4月28日那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在刊登驱逐令的同时,也全文发表了我一年前写的备忘录。鉴于该备忘录在这一事件中已成为一份党史文件,本来也不妨在这里把它详细地发表出来。不过,其中的两段文字已足够表明它的精神实质。备忘录开头写道:

“目前对我们提起的控告在于,我们对于在德国身居高位的人使用了尖刻的语言,并进行了攻击。这种语言和攻击绝非自今日始。作为一个受非常法迫害的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反映这项法律的牺牲者的心声。随着迫害的加剧,并且反社会党人法不仅被用来破坏政治性组织,而且被用来以极其专横的手段破坏德国工人的纯工会组织,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几乎无法进行甚至最合法的行动,诸如选举鼓动,被牵涉的一方的愤怒自然也强烈起来,而这种义愤在党的机关报上得到了反响,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在编辑部从德国各地收到的大量来稿中,结尾总是一再说:‘请对本文予以润色,但务请尽可能尖刻些’,尽管如此,编辑部的工作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使表达更尖刻些,而是使表达更缓和些。

谁若不是亲自经历这些,谁就无法理解:一个工人,当警察除了提出‘危害国家’这个随便怎样解释都可以的概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就把他所属的联合会(他或许已交了多年的会费)给解

散了，并且没收了金库（且不说把人驱逐出境了），那时他该是多么怒不可遏。这样的法律及其造成的后果肯定不应由下级执行机构负责，而应由上级政府机关负责，这一点对于一个象德国那样有意识地突出政府中的个人因素的国家来说，是无可辩驳的。反对制度而不反对这个制度的代表者，这在德国是难以想象的。官方不是把对于制度的任何攻击同样看成是对君主本人或他的大臣们的攻击吗！

从以上所述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中时常反复出现涉及个人的内容。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81、1882 等年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便可证明。总的说来，我认为可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写作方式比起当年资产阶级的国外报刊或流亡者报刊在人身攻击方面的所作所为，倒还温和些；《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迫害它的党的人所发起的攻击，与这些人的机关报在非常法和好心的检察官的保护下对社会民主党的先锋战士所进行的卑鄙下流的诽谤相比，还是望尘莫及的，在这些报纸上，针对我们的人所使用的诸如‘腐化堕落的痞子’一类字眼，已属司空见惯了……”

将要结束时写道：

“此外，我再重复一句：请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写作方式同其他任何一个党的战斗机关报——从保守的人民党直到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团体——的写作方式比较一下，那时人们就会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没有滥用论战和批评的权利，特别是如果人们考虑到，它是一个被镇压的党的机关报，是一个不懂得巧言惑众的社会阶级的机关报，情况就更是如此。差别在于，它有时所抨击的是哪些人。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大概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当前的德国这样

敏感。眼下我手头没有材料，然而我愿意搜集大量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在德国出版的刊物，而且绝非是反对派的刊物，时常以诽谤中伤的语调谈论外国的君主、他们的家庭成员或大臣们。例如，刚刚在不久前，民族自由党的《爱北斐特报》就这样谈论了威尔士亲王，德国报纸关于格莱斯顿所写的东西，简直囊括了一切形式的污辱。至于它们对法国部长们（例如布朗热）的攻击，那就根本不用提了。瑞士没有君主，但是，当某个在瑞士没有如愿以偿的文贼跑到德国去，在小册子中放肆地诋毁瑞士的各项制度，而德国的检察官或其他官署也没有出面干预时，瑞士却不得不听之任之，也没有哪个瑞士的官方人士想到要对那个人提起诉讼。

我和我的朋友们享受着瑞士所给予的款待和保护——当然不是作为流亡者，而是根据现存的条约——，毫无疑问，我们绝不会有意地给瑞士制造任何困难。我的阐述的目的只是要指出，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最近时期所写的东西有什么新奇和前所未闻之处，相反，对这些东西提出的抗议倒是有些新奇和前所未闻的。不过，如果说有可能出现这种抗议或者应力求避免，那么，我愿意——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可作此保证——对这一新的形势予以考虑，今后将更加慎重地行事，注意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去掉那些迄今间或流露出的粗鲁刺人的用语。当然，这丝毫不能改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原则性纲领，就象不能改变《工人之声》的纲领一样。人的问题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

《工人之声》是由瑞士同志康切特编辑的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周报。

诚然，《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8年1月连续几号的小品文栏以《当资产阶级还是激进的时候》为题，摘要发表了《自由的同盟者》杂志登载的一些文章。该杂志是作家卡尔·布林德（此人现

已成为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成员)于1865年至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杂志宣扬政治谋杀,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它一再坚决摒弃这种做法。例如,1866年5月7日,布林德的继子,年青的斐迪南·科恩-布林德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向俾斯麦开枪;行刺的初步消息刚一传到,布林德立即写道:

“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行动,如果它成功了的话,会象晴天霹雳一样传到人民中间;但即使它失败了,也值得全国人民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发动者的悲剧结局,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行动的失败所引起的普遍惋惜。”

年青的肇事者行刺未遂之后在监狱里自杀了。事实上,他无疑是受了自己继父办的刊物上的文章的鼓动而发难的。在此之前出版的许多期,颂扬了对不得人心的君主和君主代理人采取暴力行动。比如说,《同盟者》第七期发表了一份“公众舆论最高法院关于人民反对普鲁士国王一案的判决书”,判决书用二十六句话阐释了“公众舆论法庭的判决”,其中写道:

“现任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王朝的威廉,应被视为作伪誓的暴君、杀人犯、民族公敌。每个热爱正义的德国人,鉴于他所应尽的公民义务,都有权尽其所能促使上述作伪誓的暴君、杀人犯、民族公敌受到应有的惩罚。大家都应为此而努力。”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不是把这些言论或类似的言论作为值得努力效仿的榜样刊印出来的。它在汇总发表这些摘要时所加的引言中写道:

“过几天,德意志帝国国会就要讨论延长和强化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了,普特卡默先生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通过宣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片断——当然,搞那么点伪造是少不了的——来证明不仅我们的目的是应该摒弃的,而且我们的斗争手段也应

该摒弃……于是，从右翼到左翼，从天性温和的下波希米亚容克地主直到民族自由党的品行端正的模范公民都义愤填膺，都将一致赞同这位专讲美德和良好习俗的大臣所要求的一切。”

接着，为了说明容克地主在他们还没有和君主政权沆瀣一气的时候对于谋杀君主是怎么个想法，引言追忆了容克地主在与霍亨索伦王朝斗争中使用过的一句威胁它的话：

“约阿希姆，约阿希姆，你要当心，我们抓住你，定要绞死你。”

引言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和君主政权斗争期间，而且直到近代，都没有把奉天承运的统治者的生命看成是绝对不可触犯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不厌其烦地提醒今天那些一遇到什么地方出现了不合他们今天的法律格式就暴跳如雷的先生们回忆一下，他们的先驱、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自己，当着还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从而还是激进的时候，都宣扬了些什么。‘伦敦的卡尔·布林德先生’，这位各学术团体的特许成员，形形色色政治家的密友，无疑是属于‘可尊敬的自由派的最可尊敬的代言人’之一。在布林德写给慕尼黑《总汇报》、维也纳《新自由新闻》或柏林的《现代》等报刊的通讯中，人们总是首先得知，布林德先生‘刚刚与一位地位很高的外交家交谈过’，或者刚刚从某位外交家那里接到一封信，外交家在信中向布林德先生倾诉了自己对迫在眉睫的时局问题所持的极其机密的看法。他表现得象是预见到了当代绝大多数事件的政治家。如果说他当初误解了俾斯麦和威廉一世，那么，1870年以后他赦免了这两个人，‘自那以后，他就在帝国的享有特权的朋友们中间声名大振’。目前布林德在英国大骂格莱斯顿，说格莱斯顿与爱尔兰‘杀人犯’勾勾搭搭！不过，就是这个布林德，当他还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都亲手写了些什么，这可以从我们所

引证的《同盟者》的文章中看出来。”

这篇引言，将这些文章刊登在小品文栏内的发表方式，以及对这些文章的评注，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这些文章只不过要根据具体事例来说明，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从前在使用射击武器相恫吓方面都写了些什么，并且能够写了这些而没有引起愤怒的风暴。但是尽管如此，接近瑞士联邦委员会的报纸还是从中引用了一些段落，来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报》鼓吹暴力行为。联邦委员会本身在它驱逐决定所作的说明中，就抓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以类似方式所引用并加上了批判性评语的文章和报道，说这是“编辑部新策略”的标本，意在“把煽动性的论战继续下去”。《社会民主党人报》1888年2月4日那一期刊登了来自报界的说瑞士联邦委员会曾对该报给予警告的一条消息，我在这条消息后面附上了一段评语，评语并没有证实这个说法，而是声明说：

“我们忠实地执行交给我们的任务：维护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压迫者和迫害者作斗争；我们今后仍将按照我们伟大事业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发挥作用。”

联邦委员会以上述这件事为由，把这篇声明收到它的说明书里，并加了句接语：

“《社会民主党人报》用如下的言词来证明它已收到联邦委员会1月27日发出的警告。”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要不想宣布自己政治上的破产，除此之外还能写些什么呢！我觉得眼前的形势决不应等闲视之。我既不能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惹得有关方面采取一项会给我党造成重大牺牲的措施，也不能并且不愿使人对如下事实产生丝毫怀疑，即《社会民主党人报》绝不会在任何重要问题上背离党给它确定的路线。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便写了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它

的任务和纲领》的文章，以非常平静、客观但又十分坚定的语气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办报的由来、宗旨和手段，文章发表在该报1888年4月7日和21日两期上。

在这篇文章第一部分的一开头我就写道：在我看来，与其谈论那些到处流传的关于即将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实行检查的谣言，不如证实一下，如果该报要胜任自己的任务，就是说，如果它要

“取得存在的权利，那么，对它说来，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适用这样一个信条：它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要么它就根本不必存在。这个信条对整个社会民主党也是适用的。有关方面对他们认为是领导者的个别人尽可以随意处置，但是，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一天，只要使该报产生的前提条件存在一天，它就必须坚持这个纲领，并将永远坚持这个纲领。”

在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说明书里，结尾的地方都是这样说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4月7日）第十五期发表了一篇纲领性文章，其中声称，它的立场绝不会有任何改变。它写道：‘它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等等，如上文）。

在我的文章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在一切原则问题上”，而且原则一词用的是黑体字，可是说明书却把这行字全给删掉了，硬说我声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绝“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样一来，说明书就可以接下去写道：

“这就证明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人已下定决心，只按照他们自己和外国党的方便行事，他们自以为有权可以在我国的土地上继续出版这个党的报纸，而毫不考虑曾对他们予以友好接待的国家。”

如果我们面对着的是联邦委员会出自本意所决定的一项措施，那我们对于它歪曲我提出的声明和报上作出的表示，定将给予

不客气的答复。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是从德国方面施加的压力促成了对我们的驱逐，因此我们把那些接近谎言的说法看成是身处窘境的证明。

联邦委员会把驱逐的法律根据归结为这样一句话：

“鉴于

驻苏黎世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委员会的下述成员〔接下去是我们的名字和职务〕，

通过发行可疑的、会损害瑞士与某个友好国家的良好关系的出版物，而滥用了瑞士向外国人提供的东道之谊，

兹根据联邦宪法第 70 条，

决定

将上述人员〔后面附着名字〕从瑞士联邦的领土上驱逐出去。”

诚然，接近联邦委员会的报纸曾郑重地反对委员会顺从一份德国照会的说法，但是，有名望的瑞士报纸确认，德国驻伯尔尼公使，一个叫毕洛夫的先生，在前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走访联邦外交部；而瑞士驻柏林的公使则在帝国首相官邸大受训斥，他向伯尔尼写信说，联邦委员会如不“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果断措施，他将不得不提出辞职，而另一方面，瑞士如能满足柏林方面的愿望，对方答应在即将到来的使德瑞贸易条约再次生效的过程中，给予它富有价值的让步。简而言之，我们认识那些射手们，我们自己仅限于发表一篇号召书，题名为《致在瑞士的所有热爱自由和正义的朋友们》，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8年5月5日那一期的社论栏，瑞士许多颇负众望的报纸也予以转载；号召书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事实真相，并强调指出，促使柏林政府要求驱逐我们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揭露了普鲁士密探干下的卑鄙龌龊的勾当，这种密探制度的最高代表者就是柏林的普特卡默

先生。

号召书结尾写道：

“我们知道，导致采取这个措施的主谋是谁。因此，我们在即将离开这个国家时，并没有什么怨气，在我们居留这个国家的几年间，我们与它的居民始终保持了友好的交往。我们没有怨气，但却深深感到遗憾，这个国家已向邪路迈出了第一步，这条路的终点意味着，它将丧失自己的自由。

爱·伯恩施坦，尤·莫特勒，

海·施留特尔，列·陶舍尔

1888年4月21日于霍廷根—苏黎世”

驱逐与在这个国家受到高度重视的提供避难权的传统做法是相违背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瑞士人对于驱逐一事极为愤慨。许多报纸，领先的是社会主义报刊和激进民主派的刊物，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一点。人们举行了抗议集会，会上除了工人的代表以外，资产阶级作家和有名望的大学教师也都发了言，他们对联邦委员会在俾斯麦德国面前所表现的软弱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然，这并没有使事情发生改变，驱逐的决定维持不变。不过，显然对这件事并不感到愉快的联邦政府为我们的迁移提供了一些方便。它为我们的离境规定了四个星期的期限，并通知我们，如果这段时间不够，它愿意延长。此外，它还私下派人向我们询问，筹集迁移的费用是否困难，如有需要，它愿意相助。这两件事我们都谢绝了。不过，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瑞士联邦警察首脑、联邦委员会的来自瓦得州的成员路易·鲁康内特博士和苏黎世州警察总监、政府参事施特塞尔博士，两人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们对驱逐的不满。苏黎世市警察局长费舍更为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反对心情。他受命在我们出发时陪同我们离开瑞士的领土。

但是他并没有在起点苏黎世登上我们乘坐的火车，而是在中途的某一站上了车，他穿着便服坐到我们的车厢里，就象是我们中的一员。至于苏黎世的工人阶级在我们离境的那一天——1888年5月12日，为我们举行了何等盛大的示威，他们是怎样拥挤在宽大的车站广场上，拥挤在铁路桥上，把美丽的花圈（花圈的红色缎带上题着意义深刻的大字）送给我们作为我们上路的纪念，这一切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描写过，所以这里只提一下就可以了。当我向苏黎世投下最后一瞥时，我内心里充满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这一点也就提一下罢了。去伦敦，和卡尔·考茨基聚在一起，并能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交往，这个前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离开风景秀丽的苏黎世和它那可爱的湖，我的眼睛不禁潮湿了。

当然，不仅是感情的激动使我离开苏黎世时如此难过，同样使我内心不安的是，我不知道我能否象在苏黎世那样，习惯于并深入到伦敦的社会生活中去，能否象在瑞士那样，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

在苏黎世的停留不仅丰富了我的地理阅历，而且还大大地有助于扩展我的政治眼界。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德国是根本不同的，因而民族精神在许多方面也不相同。在这里，现代意义上的深入广泛的阶级斗争，还很少露头。资本主义企业主和工业无产阶级是产生了，但是前者并没有组织成一个进行斗争的阶级，而瑞士籍的无产阶级也无意为本阶级的解放去进行一场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外国人，就苏黎世来说，主要是德国人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仅限于瑞士人参加的格留特利联盟，^①

^①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1901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在1925年最终同它融为一体。——译者注

小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占着上风。在瑞士，一切特别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全民投票来决定，对于这一事实的考虑大大地削弱了瑞士工人的战斗力，因为，鉴于外籍工人即没有投票权的工人所占的比例很大，瑞士的参加投票的人就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要求来说，派系繁多，变化不定。此外，很大一部分瑞士工人的政治思想受一种骄傲感支配，觉得自己一向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工人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他们的社会追求也由于下述事实而被减弱，即1874年设立的、规定了最大限度工作日的联邦工厂法和早已在瑞士很多地区存在的地方救济机构使工人们的经济地位也较为有利。工人们在评价自己民族的这些制度时，得到了不少外籍工人的赞同，我曾有机会不止一次地看到，在这类外籍工人中，有一些在国内曾经是严格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工人。但是，即使我尽量避免对那些长处作出过高的评价，我仍然从它们对瑞士无产阶级灵魂的反作用的认识中理解到，在瑞士开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所要克服的困难，与我们在德国所碰到的困难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同样巨大的，而我一向避免进行任何可能有损于我们兄弟情谊的说教。因此，直到最后一刻，我在瑞士社会主义者当中始终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特别是，我和我的优秀战士海尔曼·格雷利希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瑞士化”）。

至于说到我在苏黎世获得的政治眼界的扩大，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同那些接近政治左派的瑞士知识分子的交往。有教养的瑞士人对待外国的态度。比起大国的大多数学者不知要无拘无束多少倍，而且因为他们几乎全都会讲至少两种语言，并且注意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认识那些大国人，因而他们的判断也大半建立在对事物的可靠认识上。我结识了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瑞士

人，他们虽然没有戴着国际的标志。但是他们的感情，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却是和国际一脉相通的。他们清楚地知道，瑞士的政治独立全靠各强国间达成的谅解，并且取决于这个由列强造成的传统是否得到维护。建立并保持一个真正的国际联盟，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他们的国家及其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永久性保障。他们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比起大国的成员在思想上要开明得多，而且怀着无可比拟的热情切盼国际问题获得和平解决。所以，和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进行一次政治性谈话，对于我来说，始终是一次精神上的享受，而且又多半是我扩大政治知识的源泉。

（解健真译）